

否定与叛逆:新历史小说的精神姿态*

黄 健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新历史小说作家对历史或现实均采取了一种怀疑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新时期西方哲学思想,如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直接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历史文学的自由精神的延续。在小说中,这种自由则主要表现为对“边缘”人的挖掘与表现;肯定世俗生活;创作主体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等。其中,女性作家的创作是非常突出的,这与她们所处的历史边缘地位的身份十分契合。总而言之,作家对历史的自为之路使历史文学变得丰富灵动。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精神姿态;否定;叛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4-0114-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751030)

作者简介:黄 健(1973-),女,广东广州人,博士,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一

中国历史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也对新历史小说的精神构成了深刻的影响。这表现为对现有、自在的历史进行自为的阐释。具体来说,对于历史或现实,新历史小说作家均采取了一种怀疑的精神,其区别于以往历史小说之处在于:

(一)自由更多地体现为对“边缘”的挖掘与表现。

作家对历史主体的选择多偏向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甚至是作家虚构出来的小角色,他们可能是农民、小手工业者,甚至可能是被正史列为叛徒、被批判、排斥的人。新历史小说对历史主体的全新的选择表现了作家主体精神的某种变化,即对主流、中心、一元叙事模式的怀疑。

以往的历史小说,虽然也以平民为主要的写作对象,但在实际的描绘中,却往往反映出作家塑造平民英雄的良苦用心。也就是说,这些平民人物,实际上在极力摆脱他们的平凡身份。《水浒传》开篇已为众好汉确定了“天煞星”的天神身份,这显然与一般的草民不可同日而语。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这种塑造英雄的倾向则更为明显。在《红旗谱》中的英雄形象朱老忠身上,集合了相当多的古代侠士之气,如他所说的“出水才看两脚泥”、“为朋友两肋插刀”、“大丈夫报

仇,十年不晚”等,都反映出极为鲜明的传统英雄气概;而与此同时,他的当代特色又表现于人物对现代革命理论的通俗阐释上,如“抱团体,伸手干”等。显然,在以朱老忠为代表的人物(包括此间大量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类似的人物,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三家巷》中的周炳等)身上,表现的更多的还是人物所代言的革命话语。通过对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作家确立了革命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作家在表现历史的过程中所行进的是一条由边缘而中心的道路。相比之下,新历史小说作家的做法却是由中心而边缘的,这具体表现于他们笔下的人物是平民,而不是英雄——这些人物始终位于历史的边缘。无论是铁凝的《棉花垛》、莫言的《檀香刑》,还是李锐的《旧址》、格非的《人面桃花》,都不再是英雄的再现,相反,作家们却在不断地消解着革命者身上的神圣光环,极力表现他们的粗俗、自私或软弱,从而将他们一个个还原到凡人的常态中去,似乎只有这样才表现出了人在历史中生存的真实面貌。这也是新历史小说作家在表现“边缘”生存状态时不同于前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自由是建立在肯定世俗生活基础之上的否定与叛逆。

新历史小说的自由意识不能说是绝对“先进”的,但它

* 收稿日期:2010-07-05

无疑是在被前人忽略的地方,展开了自己自由飞翔的翅膀。它肯定世俗生活存在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它又以质疑的目光,结合作家个人的独特体验,来审视历史的得失。在不断的否定中,它逐渐走向对主流历史的反叛,从而表达出个体独特的历史感受。古代的历史小说,虽不舍弃凡俗人生,但它却常常成为道德教化的载体,而非对作家、人物个体意识的自由表达。之后,在中国的革命历史小说中,一个很突出的精神特征便是作家对世俗、个体的摈弃。在这些小说中也有庸常人生,但作家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肯定它,而在于“提升”它,即以革命理论、理想生活的蓝图,来规范、改造历史中的“庸俗”。对于郭沫若、鲁迅、郁达夫、姚雪垠等许多前辈历史文学作家来说,“古为今用”的“用”体现于“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1](P127)}借鉴历史最根本的目的乃在于解决现实的问题。因此,“尽管是历史上的题材,如以正确的意识形态来写,便成为新现实。”^{[2](P102)}解决现实问题,成为历史文学创作的根本宗旨。但在新历史小说中,随着人们对历史叙事以及借助历史经验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怀疑,在他们的作品中已不太可能出现确定的、单一的意识形态了。历史的记忆因不断远去而变得模糊,已有的历史叙事在新历史小说作家怀疑的眼光审视下也变得疑雾重重;此时,他们所能把握的,只有当下的世俗生活。

(三)历史小说的高度自由同时也是个体想象充分得以发挥的体现。

在对中国当代历史文学有着深刻影响的前苏联革命历史文学,如《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等著中,对于个体形象的艺术想象与塑造,同样是十分显著的。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作家在历史框架中的艺术创造力,他们通过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传达了历史虚构的巨大魅力。可以说,中国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有很多前苏联历史文学的影子,但对于历史小说中艺术创作的自由,前人似乎更多地理解为对革命理论的图解,而非对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达。因此,新历史小说对作家、人物个体意识的重视与传达,也可说更多的是对海外历史文学(如高阳、金庸、梁羽生等的作品)自由精神的借鉴与发扬。

二

这种对自由精神的重视显然与新历史小说作家对历史的怀疑态度有密切的关系。在经历了“文革”以及新时期西方文化密集输入之后,很多作家对历史话语的一元化格局表现出相当的怀疑:“听了太多神圣的谎言。眼看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寻找杀人的神圣理由,你真正对人自身会产生绝望。当人赋予历史以理性的时候,也往往把历史变成对自己有利的谎言。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转眼之间就是客观真实的谎言。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我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遭遇了残酷的解体和失败,为了‘救中国’,无数人流血牺牲找到的那个‘真理’,在‘文革’当中把中国带进更深重的失败。当我们从浩

劫之中挣扎出来,再一次向别人寻找‘真理’的时候,却发现别人的真理也出了麻烦,所谓‘民主’与‘科学’的真理,所谓西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遭遇空前的危机。我们是同时从里到外的遭遇了价值否定,这个从里到外的意义失落,真是旷古未有的煎熬。这就是我体会到的中国人的精神处境,这就是多年来我一直在用小说表达的困境。”^{[3](P203-205)}正因为对神圣与真理的怀疑,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放弃历史叙事的已有视角,尝试从自己的视点出发,来考察历史存在的种种悖谬之处。因此,此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精神并非指向历史的虚无,而是历史意义的多方重建;其目的也不是寻找失落的真理,而是探索那些对人的生命价值予以肯定与促进的种种可能的思想与方式。

新历史小说对自由精神的重视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风气、思潮也不能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步入正轨、国家的经济实力突飞猛进,但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步遮蔽、贫富距离的拉大、人们社会地位的分化以及城乡的分化。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作家们显然很难一下子做出自己的回答,但现实却必然使之生发出对人生价值、理想、信仰的种种质疑,使之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对于已成定论的正史,尤其充满了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如认为“90年代的物欲狂潮将文学挤兑到‘被世俗化’的迷途,诗性被慢慢地榨干”,“日常叙事的风行取消了艺术同生活的距离,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变得暧昧不清”,“艺术向世俗的献媚所导致的后果是想象力的萎缩”,^{[4](P331)}等等。显然,人们对文学的“物化”、“世俗化”的焦虑,可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的转型,文学在精神领域中的霸主地位也日益失落,作家的“光辉形象”一再地被质疑。随着商品大潮的冲击,文学作为人类精神食粮的崇高地位一落千丈,作家再也不是往昔的精神领袖,而是被还原为凡夫俗子,甚至还可能表现出不少人格的缺陷,如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过于强烈的功利目的。这一切,不能不令作家们心头生出许多以往在写作革命历史文学时并不多见的无奈、虚空来。而日渐放松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在进一步唤醒作家沉睡多时的个体意识。在这些复杂的情感的支配下,作家们在历史小说中选择卑微的人物作为故事的主角,通过历史的边缘来折射出人类在生存中所经历的经验教训,这不仅反映了一代作家对主流、传统的怀疑,而且也是对张扬个性自由的追求。

正因为感到自身处于物质与精神的不自由状态中,作家便以在文学中展开大量的对自由的想象来获得身心的解放。他们变换出许多角度,通过对卑微人物的同情及肯定,在其以往被忽略的灰色人生中消解权威的存在,从而得以自由地阐释各自对于历史的独特印象。当然,那些卑微的主角在看待物欲与精神之关系的时候,回应是不同的,但作为新历史小说作家,却有个共同的精神趋势,即展示出不畏强势话语压迫及人生困境的真诚与执著。这便是他们通过小说而获得的最大的自由。

在这一系列讲述卑微人生的历史小说中,女性作家因其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对历史主流叙事的颠覆显得尤为积极。如铁凝的《棉花垛》不仅出现得较早,且具有典型性,因此,以下便就这部小说中的小人物以及他们所联结的历史来展开分析。

《棉花垛》中的三位女性主人公,米子、乔乔及小臭子,显然是与这些土生土长的棉花相比照的。“这里的人管棉花叫花”,相类似的,三个女子也都曾经历过如花般的青春年华,但对于她们来说,尽管是花,却是朴实无华的棉花,甚至是土生土长的、不起眼、被人瞧不起的笨花、紫花。小说中的米子尽管美丽,但却不得不以“钻窝棚”为生,对此,她的内心充满了羞耻感:“米子不愿人看到她的花,她自知那花色杂,来路不正,可它来得易。”米子卖花是为了“攒体己”,“她钻窝棚也想着以后,她要寻人,她要生儿育女,她不愿意只带着一张穷嘴走”。她后来果然“寻了当村一个鳏夫,带着体己从东头嫁到西头,不再钻窝棚,一心想跟丈夫生儿育女”;但她的后半生却并不因为她老老实实在地嫁了人而有任何改善:“米子不到五十就弯了腰,身上干枯得像紫禾。”最后还白发人送黑发人,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在传统的历史文学中,像米子这般具有“历史污点”的女性往往是为写作所忽略的,在作品中也常以反面的、被批判的角色出现,但在《棉花垛》中,显然作家对这一类的女性寄予了大量的同情。此外,她还用含蓄的笔法描绘了抗战期间农村“新”女性的形象:乔是“脱产”的抗日妇女干部,经常向民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夜校是一名积极分子,但是,她参加抗日的动机其实很单纯,也很“传统”,那便是对国的依恋。她曾经对国说过:“你一走反正心里是没了主心骨。”而当国肯定了她是自己的“战友”时,乔说:“我听的就是这句话。”在与国分手的时候,她特意向国要了他的皮带,扎在自己身上,并“觉得离抗日更近了”。可见,在对女性隐秘的心灵世界进行剖析的时候,铁凝所设的取景框并非是表面的、明朗的,如同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所叙述的那样:革命一来,老百姓在倏忽之间便全部觉悟了。她看到的是,在这些进步力量的背后,其实是充满了疑惑、功利等种种支配性的因素的。而在历史的杳杳里,能更清晰地看到普通人的生存本相,也更能揭开历史的种种遮蔽。小臭子的命运则更具有代表性。她继承了母亲米子的“传统”,在男人堆里讨生活。她原本有自己的名字——贾凤珍,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似乎从未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致当别人真的喊她的大名时,她根本意识不到那个符号与自己的关系,甚至要求别人不要再这样喊了。就是这样一株毫不起眼的“笨花”,内心也有着对幸福的渴望。她不愿意像母亲一样,不到五十岁便弯了腰,希望能有人来提亲,嫁一个正经人家。^[5]显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女性往往将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嫁一个好人身上,米子是这样,乔与小臭子也同样如此。革命的浪潮并没有在这个封闭的小村庄里唤醒人们对过往生活的反思,他们的精神是处于一片混沌之中的。

铁凝通过对历史中卑微主体的把握,对其矛盾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捕捉,在“正史”之外营造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话语的空间。她说:“在《棉花垛》里,战争只是背景,是比较虚的。我在这里写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战争也没有掩饰女人的‘被看’……女人的本相、本真的一面在这里显示出来。战争是背景,其实是写人。我没有经过战争,这是我感觉到的战争。”^[6](P68-130)可见,正史中所表现的正义的战争,在作家的“感觉”中,被逐渐推远了,取而代之的,是原来从不为人所注意的灰暗的一面,是表达作家对人性看法的一个虚构的历史空间。小臭子在战争中非常戏剧性地以自己特殊的身份掩护了乡亲及一些部队干部,这一题材在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往往是以光明、激昂的格调出现的,但在《棉花垛》这里,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她却又充满悖论地成为了战争中的“叛徒”、“奸细”,死于她原来帮助过的国的枪下。而且即便是死,也还是被当作是一个逃跑而就地被正法的叛徒,因为“叛徒”本不具备任何替自己辩解的能力,他们早已失语,就如格非在《追忆乌攸先生》中非常形象地描绘的那样:作为被审判的乌攸先生,他并不具备为自己申辩的权力,因为,他的舌头早已被割掉了。小臭子“叛徒”的身份,也是由他人来言说的,这是被强势语言“塑造”出来的。

身为女性作家,铁凝更容易体察女性内心的隐秘的心理。她自出道以来的一系列作品,如《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哦,香雪》、《玫瑰门》等篇,无不在关注着女性的生存境遇。《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表达了当代女性对美的大胆追求;《哦,香雪》将注意力转移到封闭乡村里的女孩子,她们的内心充满了对外面的世界的美好憧憬;《玫瑰门》则从三代不同的女性身上找寻着女性遭遇不平等对待、心灵扭曲的原因。可以说,她的写作一直是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意味的,对其作品的解读也往往从这个角度展开。而如今,当我们将她部分小说置于新历史小说的浪潮以及历史小说发展的脉络中时,同样也能看到她站在为正史所忽略的女性的立场上,来反观女性自身的历史与正史(男性话语所支配的历史)之间的巨大鸿沟。《棉花垛》等涉及历史的小说的意义,乃在于对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女性身份的重新确认。铁凝对中国历史中女性存在的表现反映出她对其社会地位的清醒认识:尽管经历了现代革命及西方女权主义的洗礼,但中国的现代女性依然是以历史的卑微者的身份出现的。社会与历史的状况决定了女性的成长经历,也决定了女性“伪觉醒”的卑贱的存在状态。在五六十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中国女性被当作革命的觉悟者,她们的性格几无差异地均遵循着“受压迫—反抗—觉醒”的模式发展着,似乎从革命一开始,她们便已具备成为男性战友的所有条件。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便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模式:她不断在压迫与斗争中成长,从蒙昧变得清醒,从软弱变得坚强独立,而在她的身边,卢嘉川、江华等优秀的男性革命家则充当了引路人和志同道合者的角色。这一切在新历史小说作家这里却被加以质疑:女性的生存真相被描绘成蒙昧的、落后的、依附于男性的;她们在历史中的地位,也同样

是被忽略、歪曲的。苏童的《红粉》涉及建国之初的妓女改造问题,对这一历来被世俗所嘲笑、遮蔽的特殊女性群体,作家却独具慧眼地挖掘出她们身上较之女革命家、女英雄的更为丰富的人性内涵。同样地,陈忠实《白鹿原》中所描绘的田小娥等女性人物,也不再走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那条“苦大仇深—坚决反抗—自觉觉醒”的道路,作家在其中看到的是人的内心、情感的无限丰富性。《棉花垛》在这条历史小说的创作之路中所做的贡献,便在于它对历史上的女性以及她们作为“人”的生存的拷问打开了小说家们的思索之门。它促使作家在现实的困境中,不忘自己身为社会“良心”的责任。铁凝曾经说过:她的一系列作品“有一个精神的核是不变的,不变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对人类和生活永远的爱和体贴,也就是说,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葆有的那种对生活的情义。这个情,就是情感的‘情’;义,就是义气的‘义’。生活中的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甚至表达一些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这些东西,不会妨碍你的真正的情义,你给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个写作者,还要有一份自信,不逃避责任。对文学来说,血淋淋的、残酷的、对世界不理解的、惆怅的都可以表现,但是作家本人不能随着这些东西塌陷。不管你从哪条路上走,最终还是应该为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能够保持心灵的高贵,尽自己一份义务和良知。世界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作为一个写作者,这一点不能变。”^{[6](P75-77)}对于急速变化中的社会,对于物欲极度膨胀后给人心所带来的挤压,对于作家社会地位的失落,对于种种的不平与委屈,铁凝做出了理性的回答。虽然这番话是针对文学整体而言的,但人们还是可以从新中看到新历史小说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所循之途:在颓废与边缘的历史中挖掘人性的相对真实。

历史的主体被置换为如此卑微的人类群体,这同样也寓示着作家心目中崇高、伟大、位于中心位置的“光辉形象”的轰然倒塌,从而传达出作家心中强烈的怀疑精神。这种疑虑不仅指向遥远的过去,同时亦指向当下的现实。因为既然历史原本不容置疑的根基已经被动摇,那么,所有由此根基发展而来的对主流话语一贯的信任也将不复存在。当历史的宏伟大厦坍塌之时,亦是作家对把握现实的自信力

消减的时刻。曾一度意气风发、将文学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的作家们,此时却陷入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漩涡之中。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面前,身为文弱书生的作家们多多少少有着跟不上变化节奏的无奈,以及对一元叙事的虚妄性的认识。而这一否定同时也带来了作家对主流话语所讲述的历史的断裂处、被遮蔽处进行重新审视的欲望。他们以对历史中卑微主体的挖掘与重现来表达怀疑的态度,以对卑微之人的“人”的个性、地位的肯定、颂扬来传达他们对人身自由向往。在铁凝的《棉花垛》中,革命变质为某种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利用与侵占,苏童的《罍粟之家》则深入到人的阴暗内心,描绘了极为阴郁的人生。在这些小说中,革命已不再代表着历史前进、光明的一面,而是滋生罪恶的温床。作家那种种充满自主精神的思考显然令新历史小说远离了模式、教条、定律。通过对“人”的无限可能性丰富性的发掘,新历史小说的作家对历史的自为之路使历史文学摆脱了单一的面目而变得丰富灵动起来了。而小说中的每一个人,作为能动的主体,理应表达出细腻的思想以及无限丰富而独特的心灵世界。新历史小说作家对卑微人生的关注与把握终使其在人物塑造方面开创了新意,从而改写了历史文学长期以来变化极微的创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张扬了人性之平等、自由意识。

参考文献:

- [1] 郭沫若. 沫若文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 [2] 郭沫若. 沫若文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 [3] 李锐. 银城故事[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 [4] 黄发有. 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5] 铁凝. 青草垛[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 [6] 陈骏涛. 精神之旅——当代作家访谈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粟世来)

Negation and Rebellions: on the Spirit of Chinese New—history Novels

HUANG 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New—history Novels are projectively presented by a spirit of doubt on history or reality adopted by writers. This spirit is not only the result impacted by Western philosophy of new era, such as exist, and modernism, but also continuation of the spirit of freedom from traditional literary history. In works, this freedom is mainly presented as the rebel of the hero, mining and performance of more "marginal" person, affirmation of secular life and exertion of the creative imagination. Among which, the creation of female writers is profound, and it is well—corresponded with their marginalized historical status. In short, it is writer's recreation of history that refreshes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Chinese New—history Novels; the Western New Historicism; spirit thrust; negation; rebel